

推國民教育首重師生

□杜可風

要推廣國民教育，首先應針對學生這個必須注重的對象，教育局應研究在學生教材中多加入國民教育內容。其次，教師本身起碼需要先具備這方面的知識。第三，加強香港學生與內地的交流活動。



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改變了以前奏國歌的做法，由全體委員大合唱國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都表示因此而體會到更強烈的國民意識，同時可以把個人的愛國之情表達出來。香港推動國民教育的程度向來不夠，回歸已經過了十一年，作出檢討很有必要。百多年來香港一直沒有涉入這個話題，但隨著回歸日深以及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知和訴求不斷強烈，推動國民教育顯然成為不可再拖慢的事情。

建立國民教育平台

如何在香港建立一個國民教育平台，對於推動國民教育實際作用大，只靠政府利用每天晚間新聞開的那段簡單宣傳，效果不顯著。因此，建立一個專門平台的好處是可以不斷把各種有關內容通過經常性的宣傳收到效用。最近建立的「薪火相傳」國民教育平台就是這樣的一個好平台，相信隨着「薪火相傳」平台不斷深入民心，各方利用這個平台發表國民教育知識，可以提高市民的國民身份認知。

推出「薪火相傳」國民教育平台的是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委員會，從委員會的就職儀式可以看出中央及特區政府的重視，行政長官曾蔭權聯同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尤蘭田、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港澳辦副主任周波、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廣東省副省長宋海、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王郡里少將、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秘書長安桂武、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和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出席了就職典禮。曾蔭權表示，政府將投入額外資源，有計劃推展國民教育。國家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表示，將在教材編印、教師培訓和青少年交流活動等方面協助香港，可見香港開展國民教育活動已經被提到一個新的高度看待。

依循「多重進路」策略

雖然回歸以來政府一直積極推動國民教育，老實說效果既不彰，作用也不大，深入一層思考，香港的政治局面一直未如澳門理想，原因無非三方面：一，外國勢力在歷史上受英國人縱容，進入香港時間長、陰度深，無形影響力大。二，英國殖民時代香港市民自覺認知國民身份幾近零，其中既有身份迷惘感，也因專注經濟利益而不理身份何屬。三，回歸前與歐美關聯甚於內地關係，傾向西方的意識突出濃烈。回歸初期，在一切平穩的要求下，國民教育沒有及早放到重要位置，導致了回歸已過十一年，市民的國民身份意識還十分薄弱。因此，如何加強國民教育就顯得既重要又迫切。

去年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繼續依循「多重進路」策略來推動國民教育，建議成立「多重進路」國民教育平台，協同社會各志願團體，令國民教育工作更有策略、更有系統地推行。如何顯示「多重進路」作用，筆者認為，做到以下三方面就可見諸成效：第一，在「薪火相傳」平台建立後，政府需要着手考慮額外為這個平台撥款的問題，而且要說到做到，才能令這個平台運作正常，作用更大。第二，重視走進這個平台的對象很重要，對象主要為未來的香港主人——學生，社會喊得最多的是培養下一代話題，要令香港下一代認同國民身份，第一步在於理解國家與個人的關係，第二步在於走向國家，做到這兩步，可以令他們對國民身份有清

晰的定位。第三，社會團體是傳揚國民身份認知的促進力量，不少社團舉辦的活動生活性濃厚，以具吸引力的多種生活趣味深入淺出地把國民教育灌注其中，可以在潛移默化之中令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穩固下來，並發揮與學生形成上下兩代互動的重要作用，形成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有更大融合空間。

抓三重點莫嘆慢板

政府提出的「多重進路」方法，顯然出自對香港社會及市民情況的評估，可以說在摸透社會脈搏上抓住了重點，而「多重進路」如果推動得好的話，也可以獲得事半功倍效果，問題是能否看到社會實際情況及市民的意識趨勢，並因此而配合更多的有效措施，收到更明顯效果。舉例來說，醫生看透了病人的症狀，但需要有藥物的配合才能令療效彰現，因此，在中央的重視下，政府如何在具體措施上予以配合，才是最關鍵的一個環節。這裡提出三種方法以供參考：首先，針對學生這個必須首先注重的對象，教育局應研究在學生教材中多加入國民教育內容的建議，這是最直接見效的灌輸有關知識的捷徑，這樣一來，有關國民教育的知識便可以在新一代之中更牢固扎根。其次，要更好地灌輸國民教育課題，教師本身起碼需要先具備這方面的知識，按照目前香港教師的國民教育知識情況明顯十分匱缺，因此，教師加速學習有關知識較之向學生灌輸這方面知識更應走在前面，方法可以透過速成班、基礎班、實戰班等，達到先明身份、先掌握知識，不然，為師者身乏資本，教也就無從談起。第三，加強香港學生與內地同齡人的交流，交流活動可以學校對學校，學生對學生，也可以學生對社會，譬如邀請內地有卓著成就的社會人物到香港訪問，為學生傳授經驗，或者帶領學生走進內地，訪問先進人物。

國家主席胡錦濤曾指出，「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說明中央對香港如何走出殖民管治陰影，對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既必須逐步推進，也不能視之為可以嘆慢板之事而放任自流。如果國民身份認同在新一代中繼續模糊下去而無法建立起清晰概念的話，香港人的歸屬感便會繼續處於游離狀態之下，這不論對國家還是對香港，都會造成一種負面影響。



反面教材

·三龍·



霍英東白手興家，成為海內外名人。霍家兩兄弟喜好不同，霍震霆成為香港體育界的領頭人，霍震寰則在商界打出名堂。今年兩兄弟皆齊齊有大展拳腳的好機會，東亞運動會為霍震霆創造了一個指揮千軍萬馬的戰場，霍震寰則在目前

金融海嘯中展現他的非凡才幹。自從國務院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之後，霍震寰便看到了廣東省和香港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必然有所增加的大好形勢，他作為霍英東集團的行政總裁，又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一於身體力行，在促進粵港經濟合作的層面上，就是他發揮專長的大好地方。

信心來自努力

有人形容霍震寰是粵港合作的專家不無道理，他秉承父親的宏願，一直支持粵港兩地合作。去年他當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之後，便在緊接着的「兩會」上對勞動合同法提出建議，指出該法例存在不清晰的地方，而且內地面積寬廣，每個地方的執法尺度不一，很容易引起勞資糾紛。如果沒有在粵港關係上有精透的了解，便無法提出這種既具代表性又具前瞻性的問題。轉眼今年兩會又將召開，霍震寰說，今年會繼續就「兩會」這個平台發聲，集中於經濟層面向國家提供意見，尤其是藉着中央對廣東開放綠燈的機會，他更要在促進粵港經濟合作上大幹一番。霍震寰的信心來自一向以來的努力。其實，他從去年底便看到了這樣的機遇，他以廣東省政協常委的身份，在出席省政協常委會議時，已建議粵港兩地進行產業分工，香港則可利用金融業的強項協助廣東省企業「走出去」；而廣東省則可設置「交收場」進行貨物交收。香港商界自然應在這種互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開拓更大的市場，好令香港得益。

強化商會作用

以粵港兩地的緊密關係而言，如何加以運用是一種藝術。因此，霍震寰提出了更多利用民間商會促進貿易合作的建議。他舉了一個例子：「好像台灣以前也有個電子商會，將一台手提電腦的不同部分分配給不同企業製造，這樣就可以各司其職。」的確，粵港商會的相互配合，通過互通商情，達至互惠互利，也可以利用各自的優點把產品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從而提升競爭力。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越操越精明，身越勞越強健。」相信霍震寰就是因為明白了這樣的道理，加上自小就受到父親的教誨，因而事事身體力行，今番則是落力為粵港多合作獻策。



好一句「開心地閱讀」

□丁 傘



一位張先生告訴我：有了孫女之後方知閱讀之重要；正好他的媳婦在一側，大讚公公：「老爺真好，讀那些育兒心得還會講出來與我分享！囡囡有什麼事找的是爺爺，而不是媽咪！」很久了，未曾見過這樣溫馨的畫面，公公婆婆媳婦一起出動，暢快地交換閱讀心得，為的是下一代，為的是正在幼兒園就讀的五歲小女孩。

「最重要的是開心地閱讀！」那媳婦僅是一句話，卻猶如天籟，多時已沒聽到了。現代的家長名利心太強，一切都為功利，又緊張又急躁，對下一代施以太大的壓力。這個家長說：這本書你一定要讀，多讀了你的中文水平和作文才能進步。那個家長說：讀課外書有十大好處……總之，幫的是倒忙；說得越多，小朋友越是惶恐，越是抗拒，越是畏懼：原來讀課外書是一種苦差事，原來讀課外書包含那麼多其他的目的……孩子仍未養成閱讀的習慣，已對閱讀產生了一種誤解，父母已首先打了一場大敗仗。原因就在策略性的錯誤。這位年輕媽咪，見解不錯，原來她還當過老師，難怪只偶爾談及育兒經驗幾句，卻是句句到肉，而「開心」兩字太令人興奮了！是的，閱讀要開心，乃是閱讀最大的關鍵。惟有開心，才可能讀得自覺，讀得手不釋卷，在長期的閱讀浸淫中潛移默化地獲益。除了開心，還要有一份戰略的長遠眼光。畢竟閱讀屬於長線的文化投資，其見效往往不是半月一年的，而是關乎下一代的一生。不要說書內有許多知識一旦掌握了，可能改變我們的命運；因多讀書而令我們的IQ和EQ加分的，也絕對會令我們一生獲益無窮啊！

飲水思源 感恩戴德

□方潤華

據報道，一位年老母親在新年前向事業成功、住在豪宅的兒子索取生活費不果，想要自尋短見……。

家庭糾紛不足以為外人道，但事件發人深省。一般而言，大城市居民對於孝順父母觀念淡薄，對自己的兒女則疼愛有加，兩者形成強烈對比，由此反映出一些倫理、道德問題。

孝順父母乃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自古「百行以孝為先」。基督教的「十誡」中也告誡世人要孝順父母。「有些人過分現實，凡事向錢看，全然不看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飲水思源、知恩報德」的優良傳統；有些人除了不孝順父母外，兄弟為錢財反目成仇、合股做買賣的朋友對簿公堂的事也有發生。因此，在當今唯利是圖的社會風氣下，有必要加強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宣傳與教育，尤其是對年輕一輩的德育培養至為重要。有道是「今日之青年，他日之老年，我們今天如何對待父母，將來兒女也會怎樣對待自己；敬愛別人者，別人也敬愛自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

互敬互愛 人間正道

古代聖賢也教導我們：「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別人對自己有恩，我們應銘記於心，特別是那些本身也在困境、危難中自己也願意幫助自己的人，在適當的時候我們要因應自己的能力、財力加以回饋。小至從父母養育之大恩大德說起，子女以盡孝道作為報答，這是基本的道德責任；大至從社會、國家的角度來看，層面更加廣泛，社會、國家對我們的照顧，有需要時我們也應義不容辭地報效。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曾說過：「不要問你們的國家可以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人們應本着良知回報家庭、社會、家鄉、國家。生活中「施與受」多的是，要感恩之處比比皆是。我們接受了長輩的教導，何以回報？聖者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教導大家要像尊敬父母一樣來尊敬老師，學有所成、貢獻社會就是最好的報答，力所能及的話捐建校舍、設立獎學金亦是知恩報德、回饋母校的一種方式；當商朋友在自己急需資金周轉時曾給予幫助、自己有能力時也一樣要予以回報，對雪中送炭之舉，我們怎可以忘記？甚至祖先的福蔭、上天的賜福也不可遺忘……

「飲水思源、感恩戴德」，讓中華民族這一優良美德薪火不熄、代代相傳。

資助文化產業計劃宜細

□上官泰英



政府為創意文化產業的振興撥款 29 億，得益部門不少，但計劃略嫌粗線條，缺少的是細節。這就不免會出現一些紕漏和遺憾。老百姓的知情權得不到尊重，此其一；其二難免有厚此薄彼、助款不當的弊病。有時，巨款聽來驚人，但竟在「無形」中耗費了，也不知花在什麼地方。譬如資助一部戲，主角片酬佔了九成（資助一百萬有九十萬用在付主角片酬），就未必合理。因此，對創意文化產業的資助，不妨發動輿論，提出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讓資助款項用得其所，不失為好辦法。

徵文比賽應有獎金

日前在中央圖書館就有為「2009 年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而設的熱身講座，其中一位講者就提出：政府財政預算中既然如此重視創意文化產業，那麼各種創作比賽就是名副其實。如假包換的屬於創意文化產業的範疇，每一篇作品都屬獨一無二的心靈產物，完全不雷同，優勝者的獎金應該再提高，冠軍應不止兩千五百港元。與會者無不發出會心的微笑。是的，目前較為大眾所知且持之以恆的徵文比賽，中小學階段讓中小學生參與的有「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供大學生和大部分青年參加（四十歲以下）的有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間大學的學生會聯辦的「青年文學獎」，而成人參加的則有中文文學創作獎。其中已舉辦了三十六屆的青文獎，過去是一直沒有獎金的，直到近一兩屆，才有少許獎金，評判也只是象徵性的車馬費一百元，沒有嚴格意義的評審費用（酬金）。另一種也由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雙年獎」雖並非徵文比賽，而是兩年一度，以評書（中小說、散文、兒童文學等多個組別）為主，已有不錯的獎金，但首獎五萬元，要是遇到「雙

冠軍」卻剩下半價，即是將五萬元一分為二，而不是再另外撥款五萬元。既然來年政府號稱重視創意文化產業，那麼對這些精神和心靈的產物，就不能太「吝嗇」地使用這些資源了，和堂堂 29 億的天文數字太不相稱。

產品宣傳不可小視

徵文比賽是「發掘」創意文化產物的重要途徑，也是「發現」這方面人才的恰當方式。除了所撥出的獎金太少之外，還有優勝、入圍名額太有限之嘆和名目太多、比賽機會不多之弊。前者指往來來稿甚多，平均質量也達到相當的水準，可是基於資源太少，常常不得不忍痛割愛，服從於除冠亞軍之外，只有三名至五名的優異獎，與參賽稿件數量相比，只佔一個甚小的比例。後者指除了香港回歸、京奧等特殊的原因而有政府以外的機構舉辦徵文比賽之外，總的來說，香港的徵文比賽名目太少，也少有機構願意參與其事。其實，這類比賽越多越好，可以出些諸如《給爸爸的情書》、《老師，謝謝你》、《我與京奧》等類的題目，發動適當的對象參加。最適合舉辦此類活動的是報社、社團和學校。可是，有些學校和報社有的是人手，但缺少的是經費。目前政府通過香港藝術發展局讓不同的團體申請資助舉辦各種活動，例如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就順利獲得資助舉辦了徵文比賽，但由報社出版的較少。此類申請，只要申請者具有一定的歷史和信譽就應撥款，數目不太大不應要求交出煩瑣的細目（賬目），令人望而生畏，寧願不申請，申請手續也該大大簡化。由此，我們也可聯想到，要發展和拯救香港電影，就要找到好劇本或適合拍成電影的「電影小說」，如要搞比賽，不該將它列在其他比賽中的一個組別，而應專設名目（例如用「電影故事創作獎」），入圍者獎以重金。

再有一個倡議是加大對創意文化產品宣傳的力度。眾所周知，對創意文化產品宣傳的黃金時代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那時，至少有六、七家報紙除設文學版

之外，還設有圖書版。雖然每周一次，大都稱為周刊，但這類報紙上的文學版，成了不少喜愛寫作的年輕人發表創作的園地。爾後這些報紙不是取消了這些周刊，就是報紙倒閉了。報社關門我們實在沒話說；報紙將文學版取消，老闆或老總的理由是讀者不看、對增加報紙銷量無助。時至今日，只剩《大公報》星期天的《文學》版還在堅持。同樣，大部分報紙也取消了圖書版。這類問題和現象其實很嚴重，政府重視「創意文化產業」為何竟是視而不見呢？既然拍了一齣電影（電影的宣傳比圖書好很多），要鼓勵人家去看（尤其是港產電影），出了一本書，要廣為人知，沒有適當的園地怎麼行？

留意「文字媒體」現狀

曾經一度，香港藝術發展局撥款資助報紙增設這些周刊，但不知怎麼的，無以為繼，無疾而終。既然報紙有顧忌，怕虧本，政府就該介入，每年撥一定的款項支持報紙搞文學版和圖書版，並提倡其編輯之獨立性和自主性，未必要是寫作圈中人做編者，因為報紙畢竟和被資助的文學刊物不同，後者萬一「所用非人」，他用的只是「自己友」的稿，上下左右都很難奈何之，依然對大眾無益。香港出版製作的「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戲劇、圖書、美術、攝影等等，多麼需要評介、宣傳，這是對「創意文化產品」產量和質量直接的促進和提高。我們目前只能從一些新導演拍出的專欄作家獲得一部電影和一本書的信息，但都顯得零碎。獲得美國奧斯卡金像獎八大獎的電影《一百萬零一夜》內容如何？翻遍了幾家報紙，竟找不到幾百字完整的介紹；獲獎「大」片已是如此，更遑論香港一些新導演拍的電影了，只見一些票房收入的高下比較，內容及水準如何則一概欠奉。香港財政預算既然那麼重視創意文化產業，那就看看如今的「文字媒體」現狀，將計劃訂得更為實際一些吧。

作者為資深出版人，作家